

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论



Hou Xinshiqi Wenxue yu Wenhua Lun

杨剑龙 © 著

中国文化历来充满着英雄色彩与隐士意味的双重情结，或以铁肩担道义式的崇高使命感规范自我的责任，或用隐匿山林放纵自我的绝对自由寻找人生的独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回避抽象的崇高、使命等深刻高尚的职责，也不崇尚天人合一式的隐士风范，而转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对于当下生活的迷恋，对于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追求，甚至表现出一种“去理存欲”及时享乐的生活态度，虽然其中透露出浓重的拜物情绪，但大众文化的现实性、及时性使它洋溢着一种生存的愉悦与生动。

上海文化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

杨剑龙 ©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 / 杨剑龙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5

(文化与文学论丛)

ISBN 978 - 7 - 80740 - 438 - 5

I. 后… II. 杨…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究—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8779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赵光敏

装帧设计

汤 靖

书名

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bcm. 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75

字数

234 千字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一版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438 - 5 / I · 552

定价

38. 00 元

敬告 如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5410805

序

杨剑龙

从文化的视角探究文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事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种现象，这尤其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国门，国外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潮纷至沓来地被介绍进来，在转型期的中国，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转型，更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思考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研究文学便成为一种倾向，这可用更为开阔的视野观照研究文学，可以更为深入地探究文学背后的文化现象与原委。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借鉴西方新批评方法的囫圇吞枣不同，在文学的文化研究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比较清醒与深入的境况，在深入研究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以比较贴切深入的方式展开文学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这辑“文化与文学论丛”共为四本，《文化的震撼和心灵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论》（杨剑龙）、《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杨剑龙）、《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钱文亮）、《知识分子影像与文学话语场》（刘忠）。杨剑龙的著作，将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两部著作分别编入了这两个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钱文亮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博士，其著作努力从“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这一角度，彰显其丰富的文学史意蕴，取得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更充分的观察与理解。刘忠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后，其著作上编选取六位代表作家，论析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心灵轨迹；下编以问题研究的方式，探寻新时期文学

话语的变迁及内在逻辑演进。这几部著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化大背景中、运用文化批评的方式，成为丛书的一个共同倾向。

改革开放后，人才的流动与竞争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学科的发展与竞争离不开人才的引进，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便是依靠着人才引进而不断发展的，我是于1987年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后来上海师范大学的，后来又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钱文亮、刘忠是先后引进的人才，对于充实与发展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辑“文化与文学论丛”的出版，也可以说显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本辑丛书本计划学科点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每人一部，但是有的教师的著作已出版，有的教师手头尚未完稿，因此暂且编辑出版四部。倘若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出版“文化与文学论丛”第二辑、第三辑。

是为序。

2008年8月于瞻雨斋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 1

第一章 后新时期小说宏观论 / 3

第一节 90年代小说创作之概观 / 3

第二节 90年代小说的审美意识 / 7

第三节 90年代小说的价值失衡 / 11

第四节 后新时期的反贪小说创作 / 15

第五节 后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 / 19

第六节 文学应该如何跨入新的世纪 / 27

第七节 大众文化与文学的世俗化 / 37

第二章 后新时期小说流派论 / 44

第一节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取向 / 44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的审美风格 / 55

第三节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取向 / 71

第四节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 / 85

第五节 新生代小说的创作抉择 / 100

第六节 新生代小说的艺术追求 / 113

第七节 新市民小说论 / 126

第八节 新体验小说论 / 141

第三章 后新时期小说创作论 / 157

第一节 王安忆在当代文坛的意义和价值 / 157

第二节 王晓玉小说创作论 / 160

第三节 青年小说家创作之一瞥 / 176

第四节 朱晓琳的留学生小说创作 / 179

第五节 潘向黎的小说创作 / 186

第六节 走出“房间”的女性文学 / 188

第四章 后新时期长篇小说论 / 191

第一节 “为小镇写一部风俗史”

——评陈世旭的长篇小说《将军镇》/ 191

第二节 写出凡尘中凡人的坎坷人生

——评王晓玉的长篇小说《凡尘——赛金花》/ 204

第三节 回溯荒唐年代的弥天大谎

——读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弥天》/ 209

第四节 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感悟

——评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 215

第五节 深入探究腐败产生的人性复杂与多样

——评刘平的长篇小说《走私档案》/ 219

第六节 物化社会中的焦虑与迷惘

——评张炜的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 227

第七节 写出畸形环境下的不幸遭遇和命运

——读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 229

第八节 执著于青春小说创作中的崇高美

——读竹林的长篇小说《今日出门昨夜归》/ 238

第九节 真情的追慕与抒写

——读白桦的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 241

第十节 拳拳的乡土之情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读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 244

第十一节 用激情演绎满族古老的历史与文化

——读白玉芳的长篇小说《神妻》/ 246

第五章 后新时期短篇小说论 / 252

第一节 平淡质朴中独特的艺术魅力

——读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日子》/ 252

第二节 生命的思考与终极的关怀

——读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 254

第三节 揭示老同学聚会中不同的心理心态

——读莫言的短篇小说《倒立》/ 256

第四节	在猫与鼠的缠绵中揭示反腐败的重要性 ——读陈忠实的短篇小说《猫与鼠，也缠绵》/ 260
第六章	后新时期文学批评论 / 264
第一节	青年批评家及其文学批评 / 264
第二节	关于学术研究的对话 / 266
第三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诗学” / 270
第四节	当代文坛文学批评中的几种偏向 / 272
第七章	后新时期文学现象论 / 277
第一节	想象力的匮乏与浪漫主义的呼唤 / 277
第二节	独立人格的追求与文学创作的个性 / 280
第三节	生态危机、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 / 285
第四节	小说：塑造我们时代的人物形象 / 288
第五节	都市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拓展 / 292
 后记 / 297	

引言

文学批评既要关注历史，也应关注当下，在对于历史与当下的关注中，总结经验教训，促进文学的发展，这应该是文学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我近些年来既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又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缘由。

人们将 1989 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这是有道理的。1989 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的心理心态也有着十分明显的转变，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走下启蒙的高坛步入民间，许多作家则以躲避崇高的姿态描写日常生活、关注个人欲望，这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我曾经在《论新时期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一文中谈及这种社会转型时说：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流变，与文化思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80 年代的文化呈现出精英色彩。文学创作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在模仿借鉴中解构传统；以探索创新为目的，在求新求变中超越世俗；以形式的实验为主，在走向世界中追求个性。90 年代大众文化具有很大覆盖面。文学创作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忽视时代英雄业绩的描写；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忽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忽视典雅诗性语言的运用。

在后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中，文学创作呈现出与 80 年代迥异的风范，这

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文学发展的倾向。研究与关注 90 年代文学发展的倾向，对其进行评说，就构成了我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我常常将文学现象置于社会发展、文学思潮的背景中去观照去思考。在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文学期刊与批评家打旗号成为 90 年代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对于云集于文学旗号下的文学创作的关注，也成为近些年我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对于新写实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新市民小说、新体验小说等的深入研究，在大量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努力客观深入地予以评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成为我的一种追求。文学史的发展是由作家的创作和文学作品所构成，对于作家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就成为我对于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我总是老老实实在地一本一本作品地读，反反复复地思考，努力把握作家创作的独特处，努力将作家的创作与作品置于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中予以观照与评说。在对于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关注中，我同时也关心着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发展，呼唤文学批评的学术性，强调恪守艺术品格的独立性，关注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发展的裨益，也指出在文学的文化批评中存在的不足。我还就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等与境外学者展开学术对话，并就学术研究进行了讨论。后新时期文学的嬗变与发展常常引起我的关注与思考，本著中所收入的也就是我的思考中的一部分。

我始终推崇孔子在《中庸》中的一段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学问之道，也是处世之道，为文为人，孔老夫子说得如此精辟深刻，我力图向此方向努力。

第一章 后新时期小说宏观论

第一节 90年代小说创作之概观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刊物的举旗帜打旗号似乎成为小说创作中一种突出的景观，继80年代末《钟山》的“新写实”之后，《北京文学》的“新体验”、《上海文学》的“新市民”、《特区文学》的“新都市”、《钟山》的“新状态”、《上海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又称“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相继推出，还有“新历史”、“新乡土”、“新表象”、“新新闻”、“新笔记”等等，这些以“新”字号为标榜的形形色色旗帜的树起，虽然使文海掀起阵阵波澜，但也不能不令人感到文学圈在商品大潮面前的惶惑和急于突围。9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面貌，细细审视，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深思的特性。

一些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化的色彩。以“新市民小说”创作跻身于90年代文坛的邱华栋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那些在90年代之前去寻找理想和价值杠杆的作家们。”新时期之初的小说家们，大多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进行创作，或自觉地承担着民众的启蒙者的职责，或自然地表示出担当民众代言人的角色，寻找远大理想、强调高尚情操、追求精神价值、突出人格力量，成为理性化创作的基本内涵。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还有被人称为激进理想主义的张承志、温和理想主义的韩少功、平民理想主义的梁晓声，但是不少小说家都不再承担启蒙者的职责和代言

人的角色，他们认为“现在的价值不在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现实化’过程中”。1988年刘恒在谈到他自己的小说《四条汉子》就认为“小说是一种更大众化更直截了当的精神领域，深奥和神秘有违它的本性”。90年代不少小说家们不再执著地追求崇高和深刻，有时甚至“躲避崇高”、“回避深刻”，他们更多地注重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注重对丰富的人生的叙述与袒现，不管崇高卑劣，无论深奥还是浅薄，他们不再努力去追求思想的深刻、境界的高远，而是实实在在地写下他们感受过体验过的生活。方方的《落日》中，丁太守寡舍辛茹苦将如虎、如龙兄弟俩拉扯大，他们却将得病未死的母亲送进了火葬场；邱华栋的《眼睛的盛宴》里，戏剧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居然到大宾馆里作面首陪有钱的老女人跳舞聊天；朱文的《我爱美元》里，父亲出差特意来探望儿子，儿子竟然千方百计带父亲去寻花问柳。作家极为客观平静地写下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故事、种种人生，不作褒贬评断，他们常常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突出个体存在和自我意识，强调欲望的合理性，承认面对困境的无奈。

一些小说创作表现出生活化的倾向。90年代一批小说家的创作不再努力关注作品思想的深刻与否，而是执著地努力把真实丰厚的生活与庸常人生展示给读者，不努力去追求形而上的意味，而全力描述形而下的生活。刘震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展示生活的原初色彩，努力泡在生活的原汁原汤里，重生活而不重故事，重细节而不重情节。新体验小说强调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是小说创作的基点。新状态文学强调“它对生活的鲜活状态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保持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追求个人化的写作过程中，努力把作家自我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回归自身参与当下，甚至超越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被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虽然关注的是当下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现实关系，但是在他们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善’‘恶’的共生与分享”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刘醒龙所说的“对生活宁愿保持一份模糊与朦胧的认知境界”。90年代小说的创作的的生活化倾向，使文学创作回到了人们所关心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描写。

一些小说创作展示出一种平民化的追求。从新写实小说创作开始，小说家们的创作就显示出鲜明的平民化的追求。作家们不再以启蒙者的姿态观照生活，常常以平民化的眼光和心态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动地叙写出来。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们隐姓埋名以车夫、病人、厨师等平民身份去亲历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描写板爷儿、打工仔、丧葬工、医院里的濒死者、小酒店里的酒客、换房站里的换房人的生活，把视角与情感都置于这些平民们一边，真实地写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化色彩。被称为“游走的一代”的新状态小说的作者们，放弃了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知识分子自身故事的叙写，不再作为精英身份叙事，而作为平民身份写作。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分享艰难》、《大厂》、《车间主任》等作品，也都在写出社会转型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时，努力写出普通人的生活，在表现出生活艰难的同时，体现出作家们对于底层人们艰难生活的思考。90年代小说的平民化追求，使90年代的小说创作更加贴近民众平易近人，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使90年代小说创作向文学的大众化迈进了一步。

一些小说创作展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风貌。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然而80年代的中国文坛，似乎成为一个文学的实验场，意识流小说、荒诞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感觉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等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于中国文坛，现实主义过时了的舆论也不时泛起。步入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总体上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大回归。注重客观逼真地描写生活，强调细节的真实，成为90年代小说创作的共性，展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采。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关注细节的真实，这是新写实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主要方面。新体验小说努力与现实生活贴近，他们提出创作的亲历性、真实性、非陌生感，表现出创作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新状态小说的创作竭力放弃象征化的寓言模式，采取纪实与自传结合的叙事方法，写实成为新状态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法。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更是贴近社会靠近人生，在描述复杂的现实关系的同时，努力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90年代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在按照生活的

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规范中，并不排斥对其他艺术方式的借鉴和接受，但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特征。90年代小说创作摆脱了80年代创作对现实的疏离和对于创作形式的刻意追求而忽视创作内容，使小说创作更加关注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丰富复杂的人生，为现实主义的更新和拓展开辟了道路。

9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新”字号旗帜下，总体上呈现出非理性化的色彩、生活化的倾向、平民化的追求、现实主义的风貌，所带来的冲击和作出的建树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新”字号旗帜下的90年代小说创作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不足之处。小说创作的非理性化色彩，躲避崇高和回避深刻，往往使创作只注意生活的表象，缺乏历史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创作常常缺乏理性思考，对所描写的生活不作任何道德伦理的评判，却不时使作品成为“恶与丑”的展示与炫耀。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倾向，在追求写出生活的原色与丰厚中，却常常忽略了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与提炼，事无巨细不作分辨都写入小说之中；在关注生活的原汁原味中，有时却忽视了作品的精心结构，使写进作品中的生活更加显得琐碎；注重写作的个人化，却常常将虽具有个人化色彩却无甚意义的鸡零狗碎的事件或细节堆在作品中，甚至把个人的私生活、个人隐私写入作品中，使作品几乎成为个人生活的大展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于具有时代色彩、历史意味的重大事件的关注。小说的平民化的追求，使作家还原为平民，关心平民的思想和生活，却有时将作家们的思想意识、情感基调降格，缺乏对所写的平民生活题材的深入思考和开掘，忽略了对于我们时代中的先进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塑造。90年代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的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上缺乏细致的结构构想、深入的推敲斟酌，显示了创作过于随意与轻松，使90年代的小说创作缺少精致作品、经典作品。这些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与警觉。

原文以《在“新”字号的旗帜下——90年代小说创作之我见》为题，刊载于《文艺报》1998年4月2日。

第二节 90年代小说的审美意识

80年代末,小说家叶兆言在谈到他的小说《枣树的故事》时,竟然写了题为《最后的小説》的文章。他说:“我们已陷入小说实验室的囹圄,面对灿烂的世界文学之林,小说家惭愧而且手足无措。新的配方也许永远诞生不了。文学的选择实在艰难,大家在实验室里瞎忙一气,不是抱残守缺,便是靠贩卖文学最新的国际流行色。”“小说的实验室很可能就是小说最后的坟墓。障碍重重,左右为难,除了实验的尝试和尝试的实验,小说家很难创造出自身以外的任何新鲜事来。”他惊呼:“小说再也不激动人心,最后的道德感在崩溃,最后的情节在消亡。一切似乎都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我们不能再重新获得读者,坚守属于小说自身的最后的防线,小说的灾难就会演变为小说的末日。”^①面对80年代小说创作的实验热潮,面对80年代小说创作的日益疏离读者,作为小说家的叶兆言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焦虑感,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诸多小说家和批评家的思考,也昭示着90年代小说创作审美意识的变化。

80年代,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文学理论、文学流派的不断大量涌入与深入影响中,中国文坛打破了以往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作家们纷纷将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为摹本,把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使80年代的文坛几乎成为了艺术形式追求与探索的实验场。在80年代的文学实验中,现实主义几乎成为落伍的代名词,而追求新潮、企望创新则成为文坛的时髦。文学创作在对艺术形式的过度追求与埋头实验中,逐渐步入了误区,一味关注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执意模仿西方现代派而抛弃了写实传统,努力构筑叙事的迷宫而忽略了叙事的内涵,沉溺于语言的游戏而轻视了读者的接受,这使80年代的文学实验日益脱离现实、脱离生活,从而也日益脱离了广大的读者。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随着社会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实验创

^① 叶兆言:《最后的小説》,《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4期。

作越来越缺少市场和读者。正是在这种文学实验走入困境之中，作家们的审美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创作大多不再以形式的实验为是、以创新的追求为高，过去曾经涉足过形式实验的作家们慢慢回归了写实，过去在形式之路上执著探索的作家们开始关注起内容，现实主义的傳統悄然地在文坛勃兴，许多作家纷纷努力地关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努力观照当下丰厚生动的社会现实，努力描写社会变动中的种种真实人生，对小说创作内容的注重，对现实生活本身的关注，成为90年代小说家们自觉的审美意识，也成为90年代小说创作的主要审美倾向。

被称为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刘震云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①步入90年代，新写实小说作家们循着80年代末《烦恼人生》、《风景》等创作对生活本身关注的轨迹，刘震云写出了《一地鸡毛》、《官人》、《故乡天下黄花》等关注官场生活、反思坎坷历史的佳作，池莉写出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是一条河》、《白云苍狗谣》等观照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状态的作品，方方写出了《落日》、《何处是我家园》、《桃花灿烂》等展示下层市民生活的小说，他们的创作大多注重描写平凡真实的生活、普通庸常的人生，努力把生活的原初状态写出来。

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倡导“以‘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形式，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②。新体验小说的作者都走出书斋、走出沙龙，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许多作家真正隐姓埋名投入生活，写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新体验小说”。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王愈奇的《房主》、母国政的《在小酒馆里》、刘庆邦的《家道》、王梓夫的《破译桃花冲》、李功达的《枯坐街头》等作品，都是新体验小说的力作。新体验小说的创作，以其丰富与生动的社会生活的展示，以其对普通人的生活形态的录写，再现了当代社会真实生动的人生，新体验小说都以亲历者的视角

① 丁永强整理：《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② 《本刊'94推出新体验小说》，《北京文学》1994年第1期。

写来，带着鲜明的纪实性色彩，洋溢着生活的真实性。

新市民小说的创作倡导“‘新市民’小说应着重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探索和表现今天的城市、市民以及生长着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内蕴。‘新市民’是我们时代的新现实……”^①。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以现代都市的城市化过程为背景，努力叙写现代市民社会的世俗人生，描写现代都市市民的奋斗与挣扎、情爱和欲望，也表现了对现代市民社会诸多现象的思考与批判。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唐颖的《红颜》、张欣的《爱又如何》、殷慧芬的《纪念》、孙春平的《放飞的希望》、陈丹燕的《女友间》、何顿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凡一平的《女人漂亮 男人聪明》、孙建成的《流年图》等作品，都将现代都市的现实生活展示得生动真切，把现代都市中的都市文人、都市女性、都市白领、都市企业家、都市金丝鸟等各色人等的种种真实人生描绘得栩栩如生。

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以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为代表，他们更是把关注社会现实、体察民情民心放在首位。他们直截了当地将小说看作是面向大众的艺术，是世俗的艺术，强调创作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强调创作贴近新生活，强调创作不离开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刘醒龙说：“无论是乡村小说还是都市小说，我觉得好的都是只有实实在在生活内容的作品。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有些是写给人民群众看的，后一类作家更了不起，更长久。……作家仅仅关注自我心灵是不够的，更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② 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直面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或叙写商品社会中经济的拮据、生存的困境（何申的《大厂》、《大厂（续篇）》、《穷县》，谈歌的《年底》、《车间》，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或讲述因传统的观念与陈旧的体制导致改革的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村民组长》，刘醒龙的《菩提醉了》、《路上有雪》，谈歌的《大忙年》，韦晓光的《摘贫帽》等）；或揭示体制改革中人事的纠葛、官场的争斗（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破产》、谈歌的《天下书生》、刘

① 《“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

② 韩耀旗：《近访作家刘醒龙》，《文学报》1995年9月21日。